

煮海为盐

——官营的双穗盐场

■俞光

相传炎帝时期，胶州湾一带住着一个原始部落，其首领叫凤沙。他高大勇猛，聪明能干。有一天，他从海里打了半罐水刚放到火上煮，突然一头野猪从眼前奔过，他拔脚就追。等他扛着打死的野猪回来时，罐里的水已经熬干，只在罐底留下一层洁白的细粒。他用手指沾一点尝了尝，味道又咸又鲜。他又用烤熟的猪肉蘸着吃，感觉味道很鲜美，那洁白的细粒便是从海水里熬制出来的盐。从此，他成了中国煮海成盐的鼻祖，盐也成了人类必不可少的生活物品。

早在东周，就有瓯人“煮海为盐”的记载。唐上元元年(674年)置“永嘉盐官”，统辖浙南盐务，瑞安盐业属于永嘉盐场。

天下之赋 盐利居半

对盐，大家司空见惯。但是在古代，盐业在国民经济中却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唐代上元元年(674年)，因为国家财政困难，盐铁铸钱使第五琦提出：“尽榷天下盐，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，为钱一百一十。”(《新唐书》卷五十四)就是国家对盐业实行专卖，收购价每斗十钱，加价10倍，以一百一十钱卖出，使国家获得巨额的利润，从而解决国家财政困难。实行后，“至大历末(779年)，(盐利岁)六百余万缗(贯、两)，天下之赋，盐利居半，宫闱服御、军饷、百官禄俸皆仰给矣。”(同上)这年，盐的利润达到600余万缗，全国赋税之中，盐业利润占了一半，后宫的开支、军饷、百官俸禄都靠它来解决，可见盐业的重要。

北宋时，瑞安盐业从永嘉盐场析出，成立双穗盐场。为什么叫双穗盐场呢？因当地有一株稻长出双穗而得名。《宋史》卷一八二称，熙宁五年(1072年)，两浙提点刑狱公事卢秉权测量各盐场海水含盐量时，“温州双穗、南天富、北天富为十分”。这是古籍中有关双穗盐场的最早记载，说明双穗盐场距今至少已有近千年历史。

宋时双穗盐场的辖境为瑞安县沿海，场署在崇泰乡场桥，迄元、明、清、民国，场址未变。当时的煎盐之法，据宋赵彦卫《云麓漫钞》卷二介绍：“淮、浙煎盐，布灰于地，引海水灌之，遇东南风，一宿盐上聚灰，暴干，凿地以水淋灰，谓之盐卤。投干蓬实以试之，随投即泛，则卤有力，盐佳。值雨多即卤稀，不可用。取卤水入盆，煎成盐牢。盆之制不一，有用铁者，以数片铁合成，中叠砖为柱以承之；亦有以竹为盆者。盐户谓之享户，煎夫穿木屐立于盆下，上以大木锹抄和，盐气酷烈，熏蒸多成病。”简单地说，将海水引灌入撒满草木灰的涂地，待风干后，凿地用水淋灰，制得盐卤。再将盐卤倒入铁制或竹制的盆中，下用火，煎干即得盐。其间，采用干蓬子测定盐卤的浓度，投入即浮，说明较浓，制得盐质较好；否则，需要再煎。这种煮盐法一直延续至晒盐法的出现。由于此法用盆将盐卤煮成盐牢，故人们往往将制盐称为牢盆之利。



制盐现场(资料图)



瑞安博物馆内的三国时期瑞安制盐场景 (通讯员 何之乐 摄)

徐松《宋会要辑稿》第六册五二七九页记载，南宋绍兴三十二年(1162年)，双穗盐场产盐额24206石，共19灶。其时1石盐约120斤，则产盐额约为290万斤。而民国《瑞安县志稿》卷七则称，明宣德六年(1431年)，双穗盐场产盐5047引(400斤为1引)，计202万斤，灶丁18081丁，分为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等5团。明代该场产盐基本稳定在这一水平。

温州各盐场的产盐销往温州、处州(今温州市、丽水市)两府十三县，即温州府的永嘉、乐清、瑞安、平阳、泰顺五县，处州府的水、青田、松阳、遂昌、景宁、云和、龙泉、宣平八县。当时温州盐场的盐运往丽水，都是经过瓯江水道。所以，清光绪时的温处道员方鼎锐《温州竹枝词》叹道：“木球(筏)盐舶纷如织，都付瓯江上下潮。”美丽的瓯江上，迤逦似龙的木筏顺流而下，点点白帆的盐舶逆流而上，交织出一派繁忙的景象。

盐民艰辛 苦不堪言

官府低价收购食盐，严禁私卖，盐民生计十分艰难。

首先，制盐十分辛苦。北宋瑞安学者许景衡在《江边行》中叹道：“江边煮盐女，日垦沙中土。闻道潮干土有花，肩负争先汗如雨。”反映了双穗盐场盐民生活的艰难。明时瑞安人蔡汝修在《述作灶丁行》中作了详细的描述：“海雾濛濛春日迟，安排土具牵咸泥。咸泥牵罢运紫卤，五更出去三更归。”制卤时，顶烈日，冒严寒，餐风饮露，早出晚归。“赤日低下灶窝小，煎烧不暇归去早。但见暑气蒸毛骨，松阴极目蓬莱岛。”煎盐时，日低灶小，火熏盐蒸，暑气逼人，奢望阴凉。

其次，食盐由官府专营，为了获得巨额利润，官府一年分三次下达盐课(上交定额)，季季催课，层层盘剥，盐民苦不堪言。“初课未完迫复来，工脚扑促廊头催。青芳竹片日捶击，蛆生两髀诚堪哀。”头次盐课未完成，工头就凶狠地用榔头砸门、用竹片暴打，即使两髀生蛆也不轻饶。“中限未完秋又到，秋霖那得泥常燥。煎烧无法徒受刑，再措商钱纳完票。”第二次盐课尚未完成，秋天已经到来，秋季多台风暴雨，涂泥哪能干干燥，难以制得合格的卤水，也就无法煎烧，只得向盐商借钱买盐完成盐课。“末限催严冬又雪，况是赔逃又赔绝。”“三限才当完课办，万苦千辛几嗟叹。”办第三次盐课时，已经到了冬天，风雪交加，又如何制盐？也想逃课，但是哪能逃得了？只好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当了，

才算完课。

再次，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残酷压榨下，盐民生活艰辛。许景衡又说：“经年鬻盐盐官市，屋里藜羹淡如水。谁家滋味尽八珍，猫狗食余随帚扫。”正是应了那句民谣“卖盐的，喝淡汤；种田的，吃米糠。”蔡汝修还叹道：“东拖西欠借无方，典卖妻儿及房屋。尽数完官无卓埶，走死他乡委沟壑。”清初瑞安人朱鸿瞻在《空灶行》中也说：“东家有男卖奴去，西邻有妇逐人行。何须重吊古战场，几多白骨横秋霜。何须更讯石壕吏，几多黑夜逾垣墙。”盐民为应付盐课，卖儿为奴，典妻从人，以至家破人亡，老死他乡。而官府催课如同杜甫《石壕吏》所描述的那样惊心动魄。

改煎为晒 进展顺利

改煎为晒，是盐业生产的重大技术进步。它可以大大地降低制盐的能耗和成本，使古老的煮海为盐焕发新机。

清末，双穗盐场开始改煎(煮)为晒。民国《瑞安县志稿》记道：“清光绪季年，海安地民以筑坦制盐，其利甚溥。辄于场桥浦下倒仰汇报筑盐坦九个，并于海安所北门设盐灶一座，开海城坦业之先。”

民国期间，其时改煎为晒的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。其制法是：晒坦的底用沙泥夯实，平铺缸片或石块，坦四周围以木板或石条，中分格，每格约10多平方米；晴日清早，挑卤入坦，卤水约高2.5厘米，经阳光蒸发，当天结晶成盐。从1930年至1934年，瑞安盐场的煎灶由276座减至115座，晒坦从1333格增至1930格，盐产量则由6667吨增到10086吨。此后，受天气等因素的影响，从1935年至1948年，双穗盐场的盐产量有3年超过1万吨，有3年低于4千吨，其余的都在4千至1万吨之间波动。

新中国成立以来，制盐技术又有新的进步。1958年8月，“流、枝、滩”制卤法在场桥试晒成功，这是流动、立体、平面三结合的海水直接制卤法，有出卤快、单产高的优点，也有造价高、能耗大、抗台风能力差、效益低低的缺点。1970年，全面推广“滩晒法”，生产工艺分为纳潮、排淡、结晶、整滩等。滩晒法成本低、操作便、抗灾强、修理简便。从1970年至1979年，双穗盐场的盐产量由2755吨提高到8785吨，取得了显著的效果。此后，由于飞云江口两侧岸滩日益淤涨，海水含盐量减少等原因，盐田面积逐年减少，20世纪90年代后，基本停产。双穗盐场也光荣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。

瑞安现代作家作品知多少

■郑育友

瑞安市是浙江省的历史文化名城，素有“理学名邦”“东南小邹鲁”及“瑞安出才子”的美誉。历朝历代，瑞安已然文风鼎盛、人才辈出，清末民初“三孙”(孙衣言、孙锵鸣、孙诒让)“二黄”(黄绍箕、黄绍第)更是达到一个新高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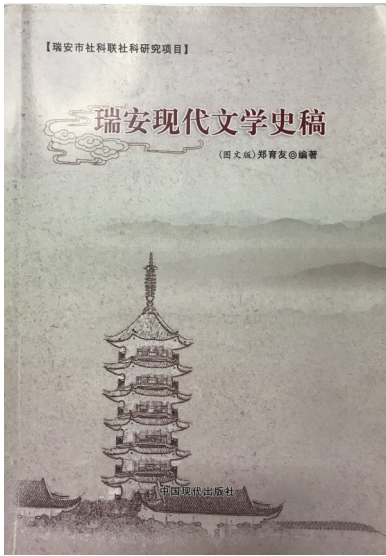
“五四”运动以后，温州人提倡白话文最有力的是周予同，他在瑞安传播新文学，为推动瑞安新文学的发展，作出较大的贡献。他不但提出用白话文写作，而且自己率先在《瓯海新潮》(1920年)发表白话文作品《国语文的价值》与新诗《秋风》；同年暑期他回故里，与在日本、北京、上海、厦门、山东等地大专院校读书或工作的瑞安知识青年金嵘轩、林伟然、万墨林等在瑞安发起“知行社”组织，推行普及教育及宣扬新文化活动，并定期订购《小说月刊》《新青年》《文学周报》《浙江新潮》《永嘉新学报》等进步书刊。在周予同的影响下，1921年10月出版的第一册《浙江十中期刊》就开始用语文发表了张绍良《对于非孝的感想》、王起《贫民一夕话》等多篇文章。

1927年至1937年，受“左联”文学影响，瑞安曾出现一批左翼作家，如胡今虚、缪天华、王剑生(王沉)、陈楚淮、王季思等人。他们追随鲁迅先生，并创作出部分进步文学作品。

从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，这一时期是瑞安现代文学史上的鼎盛时期。乱世出佳作，文学的繁荣反而往往诞生在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当中。除了二三十年代已经活跃在文坛的胡今虚等“前辈”之外，一大批诗人、小说家投身于创作抗战文学。抗战诗人有杨作雨、项牲、王沉、柯志、侯家声、如桃等；抗战小说作家有吴引一、王季思、王沉、贾力政等。这一时期，王季思在民歌体诗歌创作方面，赵超构在杂文创作方面，以及杨洛雨、黄宗江、黄宗甄、王戎等人均取得丰硕成果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瑞安四次沦陷，云江两岸屡遭日本侵略军铁蹄的蹂躏与飞机的狂轰滥炸，田园村庄被洗劫破坏，父老姐妹惨遭杀戮欺凌。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，瑞安人民与全国同胞一样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团结御侮，共赴国难。瑞安文学青年也同样踊跃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，他们肩负时代重任，用文学作为匕首，在烽火硝烟中发出了抗战的号角；他们用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话剧等形式，饱含激情，满怀壮志，创作出一篇篇振聋发聩的文章，如胡今虚的《峭岗的月夜》，杨作雨的《壁字》诗歌，吴引一的中篇小说《绿的原野》等，描绘出瑞安人民为国家独立、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进行长期艰苦卓绝、不屈不挠斗争的感人故事和英雄人物，筑起了一座座血染的丰碑。

此外，还出现吴引一的短篇小说《吴八老爷》《炼狱的一角》，贾力政的短篇小说《穷途》等，洪焕椿的科学小说《安丽和彼拉特》，之操(王季思)的小说《霉烂的一堆》(他就读于瑞安中学，住宿在玉海楼)，王沉(王剑生)的短篇小说《明珠》，风(佚名)的短篇小说《流浪女》等，这时期，瑞安小说创作进入了成熟阶段。



抗战时期瑞安散文，有缪天华在二十岁所写小品文《鸡》与《扇》，在林语堂主编的《人间世》发表，展现了创作的才华。林语堂所提倡的“娓语笔调”对缪天华的影响很深，在往后的学术研究工作之余，他总不忘情小品文的创作。还有郑伯永的《开拓新路》，杨洛雨以抗战为题材的《马》《画》《城》，王季思《送朴斋刘焯先生》，黄宗江《初恋》，王珠钗(王泉)《另有一番乐趣》，黄宗甄《渔家的一夜》，王戎《甜姐儿黄宗英》。其他散文作者与作品还有缪天瑞的《革命路上的音乐》，王剑生的《我与瑞新》，许藩的《发财和国家——痛心疾首谈之一》，胡哲民的《瑞中·创刊号》发刊辞等作品。

抗战时期瑞安戏剧，话剧的创作展示了崭新局面，现代剧作家有陈楚淮、黄宗江、王季思、胡今虚、周志侨、知玷等；传统剧作家有洪炳文、薛钟斗、项骧、郑剑西等，他们就是新文学戏剧革新的代表人物。

解放战争时期，瑞安文学作家也全力以赴，用饱蘸激情的笔，揭露旧社会反动势力统治穷苦人民的罪行，歌颂中国共产党让人民翻身当家做主的丰功伟绩。这时期，涌现了许多优秀文学作家与作品。戏剧首推陈楚淮的话剧，如独幕话剧《周天节》《血泪地獄》，通俗短剧《黑旋风》，剧本集《铁罗汉》(包治《铁罗汉》《有刺的玫瑰花》《周天节》)等，还有“卖艺人家”黄宗江的知名话剧《大团圆》与儿童剧作家萧凌创作的《少学徒》。诗歌方面有胡今虚的《小城的黎明》长诗等。

这时期，校园文学(散文)也很茂盛，如薛凝嵩的《读书不求甚解的我见》、李森南的《以牙还牙》、戴望强的《看发榜去》、显桢(周志侨)的《游仙岩》、项维新的《怅惘》、张国权的《我对于自治的感想》、张绍良的《对于非孝的感想》、洪焕椿的《我对于四二八的一点感想》、项竟的《精神国防》、彭文席的《穷理与智言》、林杰的《文学与人生》等习作。

总的来说，在1917年至1949年这三十二年间，在血的洗礼中，现代瑞籍进步作家以笔为投枪，创作了大量优秀的爱国主义新文学作品，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取得丰硕成果，为瑞安这座古城留下丰韵的文学底蕴。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加强思想道德建设

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



瑞 安 市 委 宣 传 部
瑞 安 市 融 媒 体 中 心 宣
瑞 安 市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指 导 中 心